

# 中国共产党 建设史

上册

李君如 主编

Zhongguo Gongchandang  
Jianshe Shi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人民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中国共产党 建设史

上册

李君如 主编

Zhongguo Gongchandang  
Jianshe Shi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人民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上 册

## 目 录

<b>绪 论 .....</b>	1
一、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制胜“法宝” .....	1
二、党建史是反映党的建设客观进程及其基本经验的党史 .....	4
三、党建史是党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执政党建设史 .....	6
<b>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其特点 .....</b>	10
(1921年7月—1923年6月)	
一、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历史必然性 .....	10
二、在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帮助下筹备建党 .....	22
三、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建立和党的纲领、策略、组织原则的制定 .....	27
四、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历史特点 .....	33
<b>第二章 大革命时期党的建设 .....</b>	37
(1923年6月—1927年7月)	
一、中共三大前后国共合作策略的提出及党的建设的发展 .....	37



<b>二、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初步认识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规律</b>	42
<b>三、北伐过程中党的成长壮大</b>	51
<b>四、经历党的历史上的第一次大挫折</b>	57
<b>第三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建设</b>	62
(1927年8月—1935年10月)	
一、从失败中奋起，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新时期	62
二、中共六大前后党对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的认识	65
三、在开辟革命新道路中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建党新思路	71
四、在创建红色政权和局部执政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79
五、“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的危害	84
六、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转折和党的优良作风的恢复	89
<b>第四章 从内战到抗战转变时期党的建设</b>	93
(1935年10月—1937年7月)	
一、民族危机下政治路线和策略的转变	93
二、在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中加强党的建设	100
三、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进国共合作抗日中加强党的建设	108
<b>第五章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建设</b>	122
(1937年7月—1945年8月)	
一、在制定全面抗战路线和抗日战略思想中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力	122
二、建设全国性的大党	132
三、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136
四、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	140
五、党在抗日根据地执政和执政能力建设	146

六、延安整风运动 .....	152
七、中共七大 .....	157
<b>第六章 夺取全国政权过程中党的建设 .....</b>	<b>160</b>
(1945年8月—1949年9月)	
一、抗战胜利后党面临着中国两种命运决战的考验 .....	160
二、党在从武装自卫到“打倒蒋介石”的战略转变中加强 自身建设 .....	164
三、通过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	167
四、为夺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开展整党运动 .....	170
五、严格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和民主决策 .....	173
六、建立华北人民政府的执政实践 .....	177
七、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和新中国的筹建 .....	180
<b>第七章 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党的建设 .....</b>	<b>188</b>
(1949年10月—1956年9月)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 .....	188
二、执政初期党的建设方针的提出及党组织的发展和整顿 .....	192
三、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开展和党的队伍建设的加强 .....	211
<b>第八章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建设 .....</b>	<b>232</b>
(1956年9月—1966年5月)	
一、新形势下党对自身建设问题的探索与失误 .....	232
二、“大跃进”对党的建设的冲击和破坏 .....	247
三、党的指导方针的重要转变和党的建设重新走上正轨 .....	260
四、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左”倾错误的发展干扰了党的 建设 .....	273

# 绪 论

从 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至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艰辛征途中，已经走过了 90 年历程。在这 90 年里，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转危为安、愈挫愈勇，从“革命党”转变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sup>①</sup>，并且已经连续执政了 60 多年，把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建设成了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让中华民族昂首挺胸地走进了世界的中心舞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归根到底，是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自身建设。

## 一、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制胜“法宝”

回顾中国共产党在这 90 年里所做的事，是十分辉煌的。概括起来，就是围绕“求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

---

<sup>①</sup> 严格地讲，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一个革命党。这里所讲的“革命党”，指的是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并没有失去革命精神和革命目标，还要继续领导改革开放这样“新的革命”。



裕”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做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经过 28 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独特革命道路，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为了让人民能够当家作主，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据中共六大时的不完全统计，从 1927 年 3 月到 1928 年上半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到 31 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 26000 多人。新中国成立后，据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统计，那里为革命牺牲的烈士达到 23600 多人，包括省军级党员干部 15 人、地师级党员干部 53 人、县团级党员干部 236 人。

第二件大事：经过新中国成立后 7 年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在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找到了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在对农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通过“和平赎买”政策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这一独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领导人民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国家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接着，中国共产党又领导人民进行了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那一段历史很复杂，我们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过急于求成的错误，但是今天的基础又恰恰是在那个时期打下的。比如，我们工业化所需要的石油就是在那个时期由具有“铁人精神”的大庆工人打出来的。又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两弹一星”，就是在那个时期研制成功的。特别是，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包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到社会主义制度形成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第三件大事：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开拓前进，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领导各族人民围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解决了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带领中国进入了小康社会，现在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我们用短短 30 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二三百年的工业化路程。我们的成就举世瞩目，我们的经济总量跃至世界第二，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从世界边缘走进了全球治理的中心舞台。特别是，这几年我们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抵御了苏联、东欧剧变这样的社会政治危机的冲击，战胜了特大洪涝灾害、特大地震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还经受住了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等地区性的和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的考验，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这三件大事，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切，都已经写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上。

毋庸讳言，在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的 90 年里，这个党也经历过胜利与失败、成功与挫折，甚至犯过许多严重的错误。但是，对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这 90 年历程，国内外许多人有一系列“想不到”：

一是，想不到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经历了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还能够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路程，并能够在贫穷落后的大西北重新发展壮大起来。这是当年像斯诺先生这样的西方记者克服各种障碍要到延安去采访的重要原因。

二是，想不到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只用三年时间就打败了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支持和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派。这是新中国诞生后美国顽固反共参议员麦卡锡在国会追究“谁丢失了中国”的原因。

三是，想不到中国共产党会打仗，还会搞经济建设，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到三年时间就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

四是，想不到中国共产党犯了“文化大革命”那么大的错误后还会重新赢得人民群众的信赖、拥护和支持。

五是，想不到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特别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参与经济全球化后，还能够保持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还能够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当然，还有一些“想不到”，比如想不到中国共产党会决定在新中国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出兵抗美援朝，等等。

破解这些“想不到”，就是一个大课题。人们可以从各个角度来回答这些“想不到”，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有个能够不断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坚持真理的同时又自觉地修正错误。也就是说，中国有一个能够从不断变化的实际出发，坚持不懈地加强自身建设的中国共产党。

所以，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总结中国共产党的经验时，认为“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重要“法宝”。他当时总结了“三大法宝”，一是统一战线，二是武装斗争，三是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是团结最大多数人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的法宝，武装斗争是对付敌人反革命暴力的法宝，而党的建设则是党能够驾驭这两大法宝的法宝。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失败走向胜利、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一直发展成为全面执掌国家政权的执政党，并连续执政至今而不衰败，有许多经验，其中最为基本的经验，就是重视党的建设。

## 二、党建史是反映党的建设客观进程及其基本经验的党史

我们在这里提供给读者的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史”，简称为“党建史”。

这里，有三个问题必须说明：

一是，党建史，属于党史研究的范畴，同时又同党史的全面研究有区别。党史研究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而党建史重点研究的是党史活动的主体——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历史。或者说，党建史是反映党的建设的客观进程及其基本经验的党史。这就是党建史同党史的联系与区别。

也正因为这样，在党建史的叙述过程中，与党史在时间分期上总体上一



致，具体历史阶段上时间分期也有着自己的特殊性。

二是，在研究党建史时，不能落入“文化大革命”时期盛行的“路线斗争史”的窠臼。在一个党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重大历史关头党需要作出重大选择时，出现这样的或那样的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不能随意地把这些不同认识都说成是所谓的“路线斗争”。即使有这样的不同认识甚至不同的路线，在党内开展必要的斗争，也只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党的建设的全部，更不能用所谓的“路线斗争史”来取代中国共产党党史或党的建设史。

至于境外有些所谓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夸大党的领袖的个人性格作用，并把党建史写成他们个人之间的争权夺利，更是完全违背历史真实的。

三是，“党的建设”这个范畴，包括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的党的建设，我们在这里研究的是广义的党的建设及其历史。狭义的党的建设，主要指的是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广义的党的建设，包括狭义的党的建设的全部内容，还包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党的纲领的制定，包括党在各个阶段的中心任务的确立，等等。当然，这仅仅是逻辑上的划分，在实践中这两个层面的党的建设是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因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只有围绕着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党的纲领及其规定的各个阶段的中心任务去推进，才能既保持正确的方向，又具有明显的成效。

这两个层面的党的建设，实际上是党的建设与党的工作全局之间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告诉我们，研究和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及其经验，必须从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局出发，从这一全局与党的建设互动的特点出发，去考察，去总结。这是研究和总结中国共产党 90 年党的建设的历史和经验所必须遵循的重要方法。

正因为“党的建设”有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的建设，因此在研究和撰写党建史时，也可以从这两个层面去反映党的建设的发展过程及其经验。我们

在这里奉献给读者的，是从广义层面来反映党的建设进程及其经验的历史。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努力反映党在长期艰苦奋斗中不断加强自身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而且努力反映党在制定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党的纲领，以及确定党在各个阶段中心任务的历史，并努力把这两个方面党的建设结合起来，全面地反映党的建设的客观进程及其经验。

### 三、党建史是党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执政党建设史

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史，还要从中国共产党同国家政权的特殊联系中研究党的自身建设历史。

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是 1949 年夺取全国政权，在全国范围执政的。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就是 1949 年至今的执政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具有独特的历史和经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经历了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历史过程。过去我们研究党史，对于党在革命根据地的执政史研究不够，其原因即在于没有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执政问题上经历了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发展过程。

局部执政，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执政。众所周知，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这条在当年被称为“农村武装割据”的道路，具有三个要素：一是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二是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三是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在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井冈山，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1927 年 11 月建立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1928 年 5 月建立了湘赣边界统一的工农兵苏维埃政府。1928 年 1 月，还在毛泽东指导下起草了《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对于在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提供了规范性的文件，推动了井冈山地区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在 1929 年 1 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军



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1930年3月赣西南苏维埃政府、闽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特别是在开辟中央苏区的过程中，1931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是与国民党政府在性质上根本不同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新型政权。现在我们的人民政权及其各大主要部委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制币厂等，追根溯源，都可以追溯到在瑞金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出现了国民党南京政府和共产党瑞金政府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两个政权都宣布自己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但两个政权的行政管辖能力都到达不了对方控制的区域。也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已经是执政党了。以后，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延安特区政府机构，解放战争时期建立的华北人民政府，都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和掌握的政权。我们把这种政治现象，称为“局部执政”。

毛泽东曾经从哲学上论证过这种政治现象，称它是事物在量变到质变过程中发生的“部分质变”。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就是从部分质变到质变的过程。质变就是我们所说的“全国执政”，即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执政。

当然，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又经历了两个大阶段：一个是1949年到1956年在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执政；一个是1956年以后在社会主义社会执政。由于这两个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性质特别是其经济基础、阶级状况的不同，中国共产党掌握的政权在性质和承担的任务上也不相同。

至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社会执政，还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大阶段：一个是1956年到1978年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执政；一个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背景下执政。其间，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经历了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这样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即经历了从自在执政到自觉执政的认识发展过程。

因此，考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史，自 1931 年瑞金苏维埃政权建立至今，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四个大的执政阶段。

一是在革命根据地的局部执政阶段。瑞金时期、延安时期、华北人民政府时期党在根据地执政，都属于局部执政。政权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政权。

二是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一过渡时期在全国范围执政阶段。这是从 1949 年到 1956 年，即新中国建立后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这一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为什么要把这一段划出来？因为从社会性质来讲，这一段我国处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这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也叫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其社会性质和 1949 年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同，和 1956 年后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同；从经济基础来讲，这一段我国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即存在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从阶级状况来讲，这一段我国还存在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敌对阶级除了存在着官僚资产阶级的残余，在土地改革完成前还存在地主阶级，人民内部存在着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这四大阶级，这四大阶级一直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都还存在。因此，这一阶段很特殊，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全国范围执政，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另一方面，人民民主专政建立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政权的性质依然属于新民主主义政权。

三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到改革开放前在全国范围执政阶段。1956 年我国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由于我国的经济基础已经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剥削阶级作为严格意义上的阶级已经不存在，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政权的性质也就转变为社会主义政权。在这么一个全新社会环境下，共产党如何执政，“老祖宗”没有系统地说过，我们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只能靠自己在实践中艰辛地探索。从认识论的意义上来说，我们尚处于自在执政的阶段。

四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背景下的执政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全



面总结了改革开放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执政经验，明确了把发展作为执政的第一要务，坚持人民民主，坚持把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等重要的执政原则，而且深入研究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执政的新鲜经验，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执政党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执政理论。特别是，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提出要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这三条规律，后两条规律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他们的学说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研究共产党执政规律，则是我们今天在总结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中提出的新课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并努力在实践中自觉地按照这样的规律性认识去执政，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自觉执政的新探索。

搞清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共产党从局部执政到全国范围执政的历史，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建设史，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因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掌握权力的过程中，怎么样既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又不为权力所侵蚀的自身建设经验，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中国共产党建设史，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

所以，把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史作为执政党建设史来研究，是深化党建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也是本书极力追求的一个方向。

# 第一章

##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其特点

(1921年7月—1923年6月)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和人民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动，特别是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 一、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历史必然性

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一般来说是应当与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的。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所以共产党兴起于资本主义国家，并在这些国家得到长足的发展，担负着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任务。但是中国的国情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即使与资本主义发展较为落后的俄国也有很大不同。近代中国并没有经历一些西方国家经历过的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1840年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断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正常轨道，把封建的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家中，是否需要建立



共产党，以及是否能够建立共产党，确实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对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国内外都曾有反对意见。有代表性的看法有三种：

一是移植论。持这种看法最有代表性的是蒋介石。他在 1956 年出版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的产物，乃是苏俄共产帝国的螟蛉”，即借《诗经》中的典故，把中共喻为苏共的养子，是舶来品，是苏共的移植，是苏俄利用来实行世界革命战略的工具，完全否认中共有成立的必要和可能。

二是误会论。认为是历史的误会，或者认为是部分知识分子一时感情冲动的选择。台湾学者李云汉在《从容共到清党》一书中说，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广泛地亲俄，是感情的一种冲动。

三是早产论。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华指导中共建党的国际代表马林持这种观点。他不否认中共有建立的必要，但认为 1921 年就建党是早了。1923 年 6 月 20 日，他在致越飞的信中说：“他们（指中国同志）在两年前为时过早地组织了个‘共产党’。”德国学者郭恒钰也持这种观点。他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书中说，1921 年中共的成立是“一个人为的早产”。

### 1. 苦难深重的中国需要共产党

要说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产生，必须要了解 20 世纪初的中国。毛泽东就曾说过，“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sup>①</sup>，当然也就说不清楚为什么中国非要产生一个共产党。

那么，中国共产党产生时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呢？一句话，当时的中国是苦难深重。

在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下，国家濒临灭亡。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还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

<sup>①</sup> 《毛泽东文集》第 2 卷，第 404 页，人民出版社，1993。

争等一系列战争，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苦心经营的新式陆军和海军完全溃败，战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不仅迫使中国向日本支付巨额赔款，而且还被迫割弃台湾；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中国首都北京，烧杀淫掠，野蛮洗劫，还迫使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使不平等条约更加体系化。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灭种的边缘。

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瓜分，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由封建社会逐渐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政治上，中国不再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主权国家。外国列强在中国获得领事裁判权，享有治外法权，建立租界，标志着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已经不再完整，中国法制的独立性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中国政府的内政外交也被列强操纵和控制，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在经济上，外国在华资本和依附于它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垄断了国民经济，使中国日渐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附庸。落后的传统农业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但依然处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控制下。民族工商业虽然也有一定的发展，但比重很小，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多重压迫下，十分困难。广大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榨下，人民陷入苦难的深渊。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两大历史性课题。而要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就要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要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首先就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谁能够完成这一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谁就代表了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谁也就代表了中国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

这种历史条件，决定了近代中国迫切需要一场彻底的民主革命，来赶走帝国主义，消灭封建主义，推翻反动政权，建立新的国家和社会，从而拯民族于衰败，救国家于危亡，为中华民族开辟复兴之路。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顺应历史潮流而诞生的。